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丛
CHINESE ECONOMIST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A COLLECTION OF ZHOU XIAOCHUAN'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周小川改革论集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丛
CHINESE ECONOMIST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周小川改革论集

A COLLECTION OF ZHOU XIAOCHUAN'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小川改革论集/周小川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7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丛)

ISBN 978 - 7 - 80234 - 207 - 1

I. 周… II. 周… III. 经济改革—中国—文集
IV. F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9117 号

书 名: 周小川改革论集

著作责任者: 周小川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4 - 207 - 1/F · 744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咨询电话: (010) 68990692 6899062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fazhan@drc.gov.cn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周小川

出版前言

Publication Foreword

这套丛书，是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继续推进这场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而编辑出版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的伟大事业。经济学家是非常活跃和有贡献的群体。这套丛书各卷的作者，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和直接参与者，是长期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的经济学家。他们之中有改革开放之初已年过古稀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最年轻的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有的主持或者参与过关于改革和发展重要课题的研究，有的参与过党和国家关于推进改革开放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

这套丛书各卷所选的文章，大多是过去30年间对中国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发生过直接影响的调研报告、政策建议、理论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各卷文章，都是由作者自己编定的；已经去世的薛暮桥和马洪，是由他们的后人编定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探索中前进的过程，读者从这套丛书

里，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对于改革开放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以及他们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见解和思想历程。

这套丛书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倡议的，得到各位经济学家的积极响应，得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年5月

作者简介

Author's Introduction

周小川，出生于1948年1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5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1985年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主修经济系统工程专业；1979~1985年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分析及许多经济课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6年11月至1991年9月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其间，1986~1987年任国务院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12月至1989年12月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1991~2002年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2002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08年3月连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03年1月任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现兼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周小川博士是IMF中国理事、IMF可持续长期融资委员会成员、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委员、BIS董事、BIS亚洲顾问委员会主席、非洲开发银行理事、G30成员和中国经济50人论

坛成员。分别于2001年和2004年获得《Business Week》杂志“亚洲之星”称号；2005年和2006年连续两年获得《Euromoney》旗下《Emerging Markets》报纸“亚洲最佳央行行长”称号；被评为“2004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周小川博士是享受第一批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著作十余部。其中，《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一文获199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著作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一文获1997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目 录

Contents 

- ▶ 作者自序 1
- ▶ 中央计划的改革：方向、方法与限度 4
(1991 年)
- ▶ 关于住房改革的几点经济分析 19
(1991 年)
- ▶ 走向开放型经济 26
(1992 年)
- ▶ 财税改革及整体性经济分析 41
(1992 年)
- ▶ 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道路 74
(1993 年)
- ▶ 外贸放开经营对价格体系合理化的作用 96
(1993 年 11 月)
- ▶ 社会保障：经济分析与体制建议 101
(1994 年)
- ▶ 经济学中的微观制度概念 133
(1999 年 3 月)

- ▶ 决心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及征途中的陷阱 143
(1999年7月23日)
- ▶ 提升会计准则 159
——以中国民生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为例,谈
 资本市场对会计制度改革和会计准则国际化的需求
(2001年4月11日)
- ▶ 资本充实率和及时校正措施 165
(2003年9月12日)
- ▶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几个问题 170
(2004年4月16日)
- ▶ 完善公司治理,推进资本市场发展 179
(2004年12月1日)
- ▶ 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 185
(2004年12月2日)
- ▶ 中国公司债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 202
(2005年10月20日)

作者自序

Author's Preface

1950年以来，全球有13个经济体在25年或更长期间内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7%。凭借这种速度，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几乎每十年就会翻一番。2006年4月由世界银行发起成立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在2008年5月刚刚完成汇集了全球21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金融决策者和专家观点的报告《持续增长和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重点研究了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战略问题；论述了这种持续性的高经济增长率的原因、成果和内部动态变化。我有幸作为委员会的一员，参与了报告起草和讨论的过程，从中也获得了很多有益的启发，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政策设计、发展战略制定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在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举世瞩目之际，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对发展、改革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之必要性。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稳定增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认真研究了有关增长和发展的理论和战略，借鉴了成功的发展经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问题进行的大讨论，对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批判与反思，为

日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奠定了强大的社会共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曾有两个“大讨论”：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开始的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改变了工业生产过度向重工业倾斜的状况，加大对消费品工业与流通的改革；二是对“物质刺激”的讨论，即对激励政策的讨论。这两大讨论对中国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制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此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对改革初期的发展过程和经验进行认真思考非常有意义，对没有经历这一切的年轻一代尤为重要；同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客观、实事求是的总结，结合它国经验形成客观、清晰的认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工作。2007 年，在上海召开了有 2000 多名非洲代表参加的非洲开发银行年会，会上不少非洲朋友提出希望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在今年于莫桑比克召开的非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中国也举办了一个平行研讨会，着重讨论中国的农村金融。尽管中国在农村金融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还是有很多非洲国家十分看重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希望去研究和探讨。

中国 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初期的改革和发展经验不仅限于农业，而可以总结为“三驾马车”：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外开放的外资外贸改革以及面向消费品工业与流通的微观放活。早在 1979 年中国就推出了第一部《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对公司架构、外资进入后的贸易放开经营等方面做了规定。面向消费品工业与流通，在改革起步时期简称轻工业改革，其改革内容也包括市场决定价格等一系列微观放活措施，为日后改革的推进创造了动能和经验。

值此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我们更深刻体会到对改革和发展问题进行持续、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有关发展、改革的理论和经验，随着时代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变。当前诸多新挑战的出现，将使未来发展进程与 30 年前可能大不相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信息革命带来的机遇、全球金融体系相互依赖、城市化进程推进、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教育、卫生、生态环境等一些重要议题，都需要我们不断深入研究和思考，不断根据新情况，总结改革发展的理论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未来发展和改革政策。



2008 年 5 月 30 日

这是作者在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增长报告发布活动上的讲话。

中央计划的改革：方向、方法与限度^{*}

(1991年)

经济体制改革的质朴的概念是追求一种更为有效的体制，并最终以经济发展的实绩来检验体制的有效性。如果把改进中央计划经济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应该沿着什么方向、用什么方法去实现这些改进？在选定的方向和方法之下，这种改进的潜力有多大（或者说是否存在某种限度）？改进后的理论上的模式与其他体制的理论模式相比较，性能如何？从中能得出哪些思考价值的素材？严格地讲，这项工作应该是高度数学化的，以保证推理和对比的严格性，但本文作为通俗性讨论，回避使用数学表达式，只会用到某些数学词汇。

再进一步讲，这样一个题目对本文来说仍然过大，必须在某些假定条件下使讨论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具体来讲，本文集中于中央计划经济如何能达到平衡的计划和预想的比例关系；在可能实现的若干个平衡的比例关系中如何去寻求最优的比例和增长；能否并如何去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性，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改进后的体制与其他体制相比效果如何。所采用的假定主要有以下三点：

1. 假定在充分利用现代通讯与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中央计划工作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得计划决策所需的信息。

2. 假设层级式干部队伍的行为方式和动机与中央政府保持一

* 本文原载《改革》1991年第1期。

致。

3. 在与市场体制作对比时，假定一些主要理论性概念，如帕累托境界、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大道定理等是大体上可接受的，虽然有些概念可能是有争议的。

这样，本文就集中于一个国内较少讨论的题目上，即在信息与干部队伍激励之外，计划经济体系向何处并如何去改进系统的性能。

一、从非平衡型计划走向平衡型计划

根据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特别是我国的计划工作经验来看，要想使多项产品的计划安排达到平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说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首先是“有计划、按比例”，但必须要回答按什么比例，各个产业（以及产品）之间应达到什么比例关系。本文认为至少应从三个层次上回答这个问题。最低层的要求是一种能够实现平衡的比例关系，即不至于造成资源浪费或计划无法实现的状况；更高层次的要求是能够较好地满足最终需求（包括消费与投资）的平稳式比例关系，即较少使用强制性安排最终产品使用而更多地尊重消费者主权和企业技术改造自主选择性；再高层次的要求是有利于长期增长和适应于国际分工的比例关系。

从计划工作的实践来看，人们通过产业联系平衡表的技术和几上几下的计划会议工作方式来趋向平衡型计划。产业联系平衡是一种不完整的投入产出矩阵的原始形式；中央与部门及省市之间几上几下（在我国常是两上两下）的工作方式是求解平衡解的计算过程，即从初始的试探解走向最终的平衡解的过程，同时附带有上下协商的内容。这种计划过程实质上是在求解向量方程组，即试图实现：国内生产加上进口能够等于中间产品消耗加上最终需求加上出口；其中最终需求又分为消费者最终使用、基本建设投资与技术改造投资的最终使用。

事实上，传统计划方式有根本性的缺陷。首先，产业联系平衡

表技术从信息的收集到处理、汇总、校验直至数据的完整性都是比较简陋和科学性不够的，必须由投入产出矩阵技术所替代。除了要建立投入产出的 A 矩阵以外，还必须建立 B 矩阵；在 A 矩阵的汇总平衡技术上，应采用社会核算矩阵技术，即 SAM 技术，而这又进一步要求重新审议物质生产统计体系的适用性，并且必须把第三产业的供给与需求包括在统计和计划体系之内。其次，两上两下或几上几下的年度计划工作方式从技术上就不可能真正做出平衡型计划，至多只是朝向平衡点走了头几步而已；同时，这种原始的工作方式非常耗时耗力，其间有大量的打马虎眼的做法。因此，从初始计划方案到制作出平衡型计划的过程必须改变为求解线性矩阵方程的过程，才能够确保平衡的实现。

以上这两点改进要求计划工作者有良好的投入产出模型知识、线性代数和计算机应用的基础。有人会争议，计划不必做得天衣无缝，我们也常有“留有缺口的计划”和“积极平衡”的计划。但事实上，不能达到平衡的低水平的计划无法保持中央计划的权威性，无法说明比例关系的合理性，也无法维持计划价格的建立，最终是无法说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正是这些“留有缺口的计划”和所谓“积极平衡的计划”造成计划经济必然走向退却。

在安排最终产品的使用方面，如果要求满足消费者选择的自主权和企业技术改造选择的自主权，则如何估算这些最终需求，已成为计划工作者十分棘手的难题。目前这类工作仍限于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和满足程度相当低的水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是，在存在强制性安排和市场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即在最终用户没有充分主权的条件下，要想去回答如果他们具有充分主权的条件下，会做什么选择的估计是困难的。这首先涉及到最终需求系统是否可观测的问题，其次是参数估计中会用到相当复杂的非均衡计量经济技术。传统计划以时间序列预测和横向对比回归技术为主（真正掌握的人也不多），在我国耐用消费品需求方面的计划偏差是惊人的。因此，计划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要有相当高的处理特别性的计量经济问题的

水平才能做好这一工作。

在追求平衡的过程中，对进口和出口将相应做出满足平衡的结构和比例关系，即它们能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从而使计划工作的难度大为缓解。但由于国际交换是市场体制，实物平衡的进出口结构、比例关系能否实现价值上的平衡，具有不小的风险。这种调剂余缺的结构安排是否是最佳选择也是有疑问的。

另一个难题是这种计划模式如何对企业的技术进步与稀缺资源的节约给出合理的指标。实践中常常只是承认现状而已。

二、从平衡到优化

如果把市场经济体制理解为无政府主义的周期性危机的、混乱不堪的万恶之源，则中央计划经济能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就已更为高明了。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市场经济都并不是那么糟，古典的市场经济就把市场配置资源表达成了帕累托最优境界，即最为有效地利用了各种稀缺资源。宏观经济学和对策论的出现又进一步论证了如何确保实现帕累托均衡而不至于停留在某种纳什均衡上（简化地讲，纳什均衡大致上是能达到某种均衡但又未实现最优均衡的一种状态，本文避免作数学概念的描述）。这种经济体制的竞争给中央计划经济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不是说有计划、能平衡、按比例就肯定能胜过市场经济，还必须回答按什么样的比例？达到什么样的平衡？这种比例和平衡是否是最优的选择？这样，计划工作就必须转向追求最优平衡和最优比例，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起码会在理论上败于市场经济。

在计划实践中，假定我们有两个国家计委，按传统计划方法做计划，有极大的可能会得出两组不同的计划，它们都能实现平衡并达到据称是有计划且平衡的比例关系。同理，如果假定有 N 个国家计委，会做出多组不同的平衡计划，因此必须用某一种标准（或目标函数）从中选出最好的计划。从方法论的分析出发，无法保证这